

同仇敵愾

日寇嚴刑 村民寧死不屈

「保護戰士，我很光榮！」

以鄧姓族人為主的黃毛應村，是西貢人跡罕至的小村落，曾經的游擊隊「小鬼」，如今的九旬老人鄧小南接受《大公報》專訪，講述村民與游擊隊員守望相助，共同抗擊日寇的英勇故事。

鄧小南如今已年近九十歲，說起抗戰時做「小鬼」的經歷，依然神采奕奕。他憶述游擊隊員剛入村的情景：西貢地區匪患橫行，那時村民一見到陌生人入村，便先入為主當他們又是一波土匪，哪知他們「又不確又不搶」，只是不時與村民聊上幾句，態度也分外客氣，慢慢道出自己是前來抗日的游擊隊。他又說，當時日軍佔領西貢，區內幾位神父無故被殺，黃毛應村用來做禮拜的玫瑰小堂就此閒置，久而久之成為了游擊隊隊員的據點。

小教堂「中轉站」

而黃毛應村當時與附近的嶺上、赤徑及大浪村有緊密聯繫，此後亦逐步發展成為游擊隊基地。及至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，東江縱隊九獨立大隊在黃毛應村小堂宣布成立。鄧小南告訴記者，黃毛應村是個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，自從日寇入村，村內青壯年早已組成了自衛隊，鄧小南的兄長亦在其中，與港九大隊游擊隊員並肩作戰。鄧小南當時不過十一、二歲，眼見兄長能貢獻國家，自己也嚷着要「打倒日本仔」，便加入了村里的兒童團，成了一名送信、做宣傳的小鬼。他說，兒童團雖然不能扛槍作戰，「有吡威」，但遠遠見到「日本仔」過來，撒腿就跑去給游擊隊員通風報信，能參與保護戰士們的任務，他感到很光榮。

兩年間，約有七十名游擊隊隊員定居和駐紮在這小小的教堂裏，教堂內還儲備了游擊隊的補給、武器和軍火。不僅如此，由於黃毛應村特殊的地理位置，玫瑰小堂亦成為前往西南部的「中轉站」，為往來人員提供歇腳點、食水、物資及庇護。



▲當年的游擊隊「小鬼」鄧小南（左）與東縱歷史研究會顧問羅叔清聚首話當年。

鄧小南的父親鄧福，當年被日寇嚴刑迫供，即使腰骨折斷、雙腳燒傷，依然沒有透露游擊隊的行蹤。



然而在一九四四年秋天，在教堂發生了一段悲壯的故事。鄧小南憶述，游擊隊本來抓到漢奸楊九仔，卻讓他逃跑了，隨後他還帶着日寇回來報復村民。那天早上，日寇包圍村民，帶着楊九仔在人群中轉來轉去，仔細地進行辨認，但始終沒有找到游擊隊員，日寇轉而向村民下毒手。敵人將鄧小南的父親鄧福，以及鄧德安、鄧成奎兩名青年等抓到村裏的教堂去，對他們嚴刑逼供。

灌水火燒倒吊 兄弟班誰也不就範

鄧小南轉述父親鄧福的回憶說，那日本軍官拿着一把閃閃發光的東洋劍，架在他頸上，威脅他說出游擊隊的情況。這一招失敗之後，鄧福又被灌水，一勺勺水從口鼻灌進去，頂不住暈過去又被潑冷水叫醒。見鄧福依舊不就範，日本軍官又用一條扁擔壓在他的肩膀上，兩名日寇分頭踩上去，硬生生踩斷了他的腰骨，無法動彈。日寇隨後又用麻繩綁住他的雙手，吊在教堂內的橫樑上，還在腳下點着禾草往上燒，鄧福的雙腳都被燒爛了，慘叫聲震憾了教堂內外。其餘二人同樣受着如斯酷刑，鄧德安的雙腳幾乎被燒焦了，骨肉都露出來，被折磨得不省人事，鄧成奎亦數次被燒到暈了過去。

面對日寇嚴刑酷打下，三人堅貞不屈，沒有吐露半點游擊隊的活動情況。日寇最終洗劫全村，將所有牲口、財物搶掠一空。日寇走後，村民立即對三人進行搶救，然而鄧德安傷勢太重，三天後便犧牲了，年僅二十歲。鄧福因腰骨折斷、雙腳燒傷，醫治了半年才能下床，受傷較輕的鄧成奎也醫治了三個月才痊愈。

鄧小南說，他們兄弟幾人被父親的英勇無畏所觸動，更加堅定了信念，於是哥哥鄧振南、鄧民友毅然加入了游擊隊，為保衛家鄉，保衛國家而戰鬥。年幼的他繼續着「小鬼」的抗日宣傳工作，抗戰勝利後便加入了由鄧毅、范長江等愛國知識分子創辦的《華商報》，將自己的愛國情懷融入工作中，希望影響更多的人。

1941年12月，日軍入侵香港，香港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。中共領導下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（東江縱隊前身）迅即進入香港新界地區，肅清土匪，組織民眾開展抗日救亡工作。其中，西貢是游擊隊的重要根據地：1942年初，東江縱隊九獨立大隊於西貢黃毛應村宣布成立；1944年，空襲日軍受傷的美軍中尉克爾獲救後，曾輾轉經西貢離港。西貢斬竹灣，有一座抗日英烈紀念碑……到西貢走走看看，尋找那些年的紅色足跡。

大公報記者 常或璠(文) 梁堅、文濤(圖) 受訪者供圖

紅色印記西貢尋



●黃毛應村玫瑰小堂，當年是游擊隊隊員的駐地。

●1944年秋天，日寇在玫瑰小堂內殘害村民，村民寧死不屈。

●鄧小南(上排)與大哥鄧振南(下排右)、二哥哥鄧民友(下排左)。

●惠陽坪山人民送給克爾中尉的錦旗，上面寫着「空中英雄」。

●克爾中尉所駕駛的P-40E型號戰機。

●克爾的兒子根據他的日記，尋找父親當年藏匿的山洞。

●克爾與妻子維達的合照。

●克爾手繪的漫畫，描繪戰機被擊落後跳傘逃生的情況。

飛虎情緣

聯手抗戰 東縱救美兵

「跟我來，我帶你回家！」

「我現在帶你回家！」這句印在《克爾日記：香港淪陷時期東江縱隊營救美軍飛行員紀實》封面上的話，緩緩揭開了故事的序幕：美軍飛虎隊一級中尉唐納德·克爾(Donald Noel)，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執行轟炸「日軍基地」香港啟德機場任務時，被日軍擊落，後為東江縱隊游擊隊戰士所救，經歷驚險的逃亡，最後平安歸國，並將歷時二十七天的被救過程完整地寫在日記上。二〇〇八年，克爾的兒子戴維帶著父親留下的珍貴史料來港，向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，與戴維一同重溫克爾當年的脫險路徑，身為研究會顧問的羅叔清亦參與其中。他感慨道，這一段中美大國之間的「飛虎之情」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

兩國人民 兩代情

「我們永遠都是一家人！」

羅叔清說，隨後幾年，當年參與營救的老戰士一位又一位告別塵寰，戴維及家人數次不遠千里前來，在烈士碑園獻花祭拜，以表謝意與敬意。在二〇一〇年十二月，戴維前往深圳坪山祭拜老戰士李兆華時，帶來了一幅鑲在相架內的卡片，兩側分別是克爾與李兆華的合照。

相隔大半世紀 克爾兒子帶着感恩回中國

於是，二〇〇八年戴維探訪了坪山東縱紀念館，隨後在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，以及東縱「第二代」的協助下，他在香港的一間安老院見到了李石。當年克爾中尉降傘後第一個拯救他的東縱「小鬼」，如今已是白髮蒼蒼。相隔六十年的情誼竟能再續。戴維親筆寫了一封感謝信給老人，感謝他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保護了父親，感謝他在危難面前的無私行為，挽救了許多生命。告別李石，戴維隨後又見到了老戰士詹雲飛。正是他把那句「跟我來，我現在帶你回家」的字句寫在手繪地圖上，遞到克爾中尉手中，令克爾重燃生存的希望與熱情。大半個世紀後，這句、這字，再次回到中國，出現在詹雲飛的面前，場面令人動容。



▲曾生司令(中)為克爾中尉送行。

不忘眾英烈 籌款百萬立碑致敬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港九大隊的鄉親們念念不忘犧牲的英烈，一直想給他們立一座豐碑。新界社團聯合會榮譽會長羅叔清表示，一九八四年，中英談判展開，為修建烈士紀念碑帶來契機。當年五月，原東江縱隊司令曾生出國訪問，途經香港，到當年港九大隊的根據地西貢看望老鄉親。他得知大家想為犧牲者建紀念碑，欣然題寫了「抗日英烈紀念碑」。於是，趕在一九八四年的最後一日，西貢各界代表成立紀念碑籌建委員會，在主席劉運喜的帶領下，選址、籌款、設計和修建各項工作正式啟動。西貢居民與老戰士們積蓄無多，籌委會便先後到內地、國外走訪，在得到各方的支持下，終於籌集到建碑所需款項。「當時的一百萬可是巨款啊！」羅叔清感嘆道。

步槍造型象徵游擊隊員

據羅叔清介紹，紀念碑由華南理工大學的師生於一九八六年設計，籌委會最終選擇了以步槍為原型的設計方案，游擊隊員們平安歸來時都會將步槍立着擺在牆腳，見槍如見人，因此以步槍象徵游擊隊員，再合適不過。

籌委會本想選址在黃石碼頭等「文化大營救」必經之路上，後來因紀念園的佔地面積較大，遂轉而考慮其他更為開闊的地點。羅叔清說，籌委會在主席劉運喜的帶領下，走遍西貢的荒郊野嶺，某日途經斬竹灣畔，眼見這塊疑似閒置運動場的空地面積適中，便多方打聽其歸屬，才知道那是水警的籃球場，屬政府用地。羅叔清告訴記者，雖然當時港英政府閉口不談港九大隊，但是華人官員卻鼎力相助，大家都認為港九大隊的抗日事跡是香港人值得驕傲的一段歷史。因此，那籃球場順利成為了墓園用地，且每年只需向政府交一元的象徵式牌照費。

▲抗日戰爭勝利後，老戰士們以及西貢的鄉親們念念不忘犧牲的英烈，於是籌款立碑。



▲兩國人民兩代情，羅叔清與戴維的家人，以及東縱的後人一同合照留念。

片，中間則是一塊將美國國旗與中國國旗連在一起的繡片。卡片上，克爾更以文字表達心意，寫着「兩位士兵能夠相遇，是我們國家的榮幸」。隨後，戴維將其交給李兆華的兒子江山，兩人的手緊握在一起。「我們永遠都是一家人！」戴維動情地說。江山亦說，「希望我們中美之間的友誼長存！」

羅叔清說，當年中美兩國因「抗戰」走在一起，隨後便有了中美合作的佳話。克爾中尉與老戰士的這段「飛虎情緣」，確認了東江縱隊是真正的抗日隊伍，證明了本侵略者所付出的心血，不單與港人同舟共濟、共渡難關，還援助外國友人，對抗戰作出巨大貢獻，也體現了包容與大愛無疆的精神。

終於，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，紀念碑揭幕，愛國人士同聚一堂，向抗日英烈致敬！